

釣島之爭改變地緣政治

□彭越

都超越心臟地帶。我國正處在西太平洋地區大陸與海洋交界的邊緣地帶，而且人口眾多，經濟趨於發達，國勢日盛。陸權海權兼備的中國在國勢上全面超越島嶼型的日本，中國奪回對釣魚島的控制權是非常可能的。

要應對釣島歸期不遠

四是綜合國力對比的變化將使釣魚島現狀的變化趨勢不可逆轉。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當年中國的GDP為58786億美元，比日本多4044億美元），居世界第二。而軍事力量方面，除海軍大型艦艇稍弱外，中國的陸軍和空軍超過日本甚多，戰略核力量則是我有日無。例如，在現代常規軍力中最重要的空中力量方面，中國已經改變了近一個世紀的弱勢局面，全面超過了日本——在第三代戰鬥機的數量對比上，中國空軍以500：300取得了優勢；中國預警機力量也後來居上，並對日本預警機形成了全面的超越，對中國空軍的優作戰形成了極強的支撐作用。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最近釣魚島風起雲湧，8月15日中國香港保釣人士衝破日本艦船的圍追堵截成功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8月19日日本右翼人士也登上釣魚島，中日對釣魚島的爭端趨於緊張。實際上，釣魚島之爭不過是中日長期歷史競爭的一個縮影，更是西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變遷的一個先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釣魚島的現狀一定會改變。

國力強有望重控釣島

一是邊界動態論。簡單來講就是一個國家的邊界是隨着國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動的。二戰時的德國將此觀點作為德國擴張生存空間的理論依據，使得地緣政治學受到學術界的批判。其實地緣政治學時期的特殊狀態，從一般意義上來講，邊界動態論

反映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既一個國家國力上升而鄰國國力下降時，該國的邊界很有可能向外擴展，與之相反時邊界就可能向內收縮。例如，蘇聯成立後直到二戰結束，蘇俄國勢急劇上升，蘇俄的邊界向西、南、東三個方向都有擴展；反之蘇共政權瓦解後，俄羅斯的邊界大幅向內收縮，丟失了大量國土。同樣，近代中國由於國勢日衰，相對於清朝鼎盛時期，中國的邊界在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大幅向內收縮，在東面就丟失了台灣及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現在中國國勢上升，根據邊界動態論，中國重新控制釣魚島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是國家地理邊界與利益邊界差異論。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的地理邊界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隨着一個國家的國力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該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擴展到地理邊界之外或收縮到地理邊界之內。例如，二戰後美國國勢上升，其國家利益就溢出國境進而遍布全球。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力不濟，利益邊界就大幅收縮，有些地區甚至收縮到地理邊界之內（例如俄中央政府一度失去對車臣地區的控制權）。歷史上由於朝貢體系的存在，中國周邊有大量的藩屬國（包括被日本非法吞併的琉球王國），因此中國歷朝都是利益邊界在地理邊界之外的。近代中國隨着半殖民地化進程的加劇，西方列強在中國不但強佔租界，還劃分勢力範圍，大多數省份處於半獨立狀態，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方相當有限，國家利益邊界縮小到極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國力逐漸恢復，國家利益邊界逐漸外推，但至今在不少地區利益邊界尚未推到地理邊界之外（如東海、台灣、南海、藏南等地區）。今後，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繼續增強，中國的利益邊界超出地理邊界完全是有可能的，釣魚島重新回到中國利益邊界內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邊緣地帶論。二戰後，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則於20世紀40年代基於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概念，提出了相應的「邊緣地帶（rimland）」學說。他認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發生在邊緣地帶，而且邊緣地帶在經濟上、人口上

立會選舉的不變基數

□盧兆興



儘管傳媒把9月立法會選舉塑造為一個激烈的政黨爭奪戰，儘管有民調預測「泛民」在直選中只拿到八至十九席，各類推測和分析皆忽略立法會選舉中的三大不變基數。

首先，無論「泛民」在立法會功能及直選中拿到二十三或二十四席與否，他們皆不能成為立法會中奪取至少一半議席的政治力量。換句話說，特區的「行政主導」體制基本上不會受到大衝擊。雖然「泛民」可能拿掉二十四席以阻止政府提出的法案或政改方案得以順利通過，但情況將不是外界般描述得那麼嚴重。

第二，「泛民」將難以取得功能議席中過半的議席，意味着功能組別的議員於9月後仍將起了制衡由直選部分選出的議員之提案、動議和投票力量。功能組別仍由建制派主導，亦意味港式「上議院」（即由功能團體選出之議員）仍可制約全面直選的「下議院」（即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最後，直選中的建制派仍擔當有效制衡「泛民」之角色。由於「泛民」並不團結，建制派內內所謂「內訌」其實對制衡政治無大影響，因為兩個陣營皆非常鬆散。故此，無論建制派在直選中能否取得百分之四十的票數，而「泛民」可否拿掉選票中的傳統百分之六十，其實亦影響不大。

最大影響反而是政府威信及權威方面，由於「泛民」將很可能仍維持立法會的少數政治力量，而建制派仍將成為立法會內的最大政治勢力，預計特區政府現今所受的批評將可能稍為減少。畢竟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後將會重整旗鼓，故此政府的所謂「管治危機」很可能在九月九日後穩定下來，特別在施政報告的制度方面，行政立法兩個機關將會回歸多點合作的夥伴空間。

總括來說，立法會選舉將不會有大驚喜，反而將顯示三大不變基數之政治延續。而管治問題可能隨着選舉結束而慢慢回復「正常」。

作者為教育學院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不許騙票

黃牛

香港企業應承擔社會責任

□方潤華

閱7月19日人民日報《學術隨筆》專欄張聖兵所寫《企業為什麼應承擔社會責任》一文，論述精闢，言之有理。現代管理學推崇企業社會責任，對商界影響深遠，作為營商六十餘年的老一輩商人，雖不諳太多高深理論，但亦贊成企業社會責任與「取之社會、用諸社會」之質樸祖訓有異曲同工之處，值得成功企業家重視。可惜當今部分企業急功近利，為牟利將社會責任丟在腦後，其結局最終害人害己、信譽盡毀，例如眾多的假冒黑心產品令人對中國食品總是心存疑慮，實乃罔顧企業社會責任之惡果，也是當代管理學上最令人痛心的反面教材，值得借鑒。故此企業勇於承擔、完美履行對社會的責任，不僅有助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對企業本身亦有監督促進作用，有利無一害。

若說「嚴守道德、堅持誠信」是企業必須遵守之社會責任，那麼「回饋社會、造福民眾」則是企業相對寬容之責任，正如慈善捐獻亦素以「隨緣樂助」為規則，一切屬自願性質，但筆者認為香港之企業確有這樣的義務，因為本港所得稅只約16.5%，投資所收股息不用付稅，較內地及大部分國家為低，故此企業持人及富商應考慮抽撥若干百分比之利潤，捐予「兩岸四地」慈善用途，例如：支持各地教育、醫療發展，提高文化水平及做好防病保健工作，全面提升國民質素；另外幫助殘疾、老弱及母嬰等公益事業更是令弱勢社群直接受惠之善工，優秀之企業家在享受成功之餘，務必念及無數未能得享經濟成果的窮苦同胞，「處富貴地，要矜憐貧窮之酸辛」是中國古老之傳統，只有發揚互幫互進精神，才能達致「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之社會和諧局面，富豪擁有多於常人財富，若未能對社會作出有益貢獻，難免招致「仇富」現象，相反若富而好仁、樂善好施，扶貧濟困、造福人群，則定能得到世人的敬愛與尊崇。

香港既是賺錢的福地，亦是慈善事業蓬勃之地，老一輩企業家成功之餘均將「回饋社會」視為應盡之義務，無數善長仁翁為社會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相信他們傳予後代的不僅是財富基業、管理經驗，還有「樂善好施」之家族傳統，新一代港人定能薪火相傳不忘本，青出於藍創新猷，令香港的財富與慈善比翼齊飛，大家共享繁榮！

作者為方樹福堂基金主席

識破和粉碎反對派伎倆

□周八駿

反對派政治力量竭力煽動社會情緒，既「拒中抗共」又把矛頭對準所謂「地產霸權」即社會基本矛盾的對立面，是為了趕新特首及其管治班子下台，也是為了盡量爭取立法會更多議席，根本目的則是爭奪香港特區管治權。只要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長期而言，香港的政治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矛盾必將得到妥善解決。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安排，使得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與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在2012年同一年相繼舉行，這是二十年才有一次的際遇。今年香港政局，固然不取決於這一因素，但是，這一因素毫無疑問是加劇了香港政情的緊張和激烈。

經過近十多年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在相互糾結中不斷演變，在去年第四季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拉開序幕前，香港已形成兩個基本矛盾——政治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矛盾。前者是「拒中抗共」與愛國愛港的對立，後者則是由貧富差距惡化而衍生的階級對立。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始終圍繞着這兩個基本矛盾展開，但在競選階段的大部分時間，準確地說，從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中旬投票前一個星期，是以社會基本矛盾為主，對競選結果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政情更趨複雜尖銳

值得重視的是，從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最後一星期開始，直到第五屆立法會競選展開，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上升為香港社會的主要關切，同時，香港公眾對於社會基本矛盾的關切程度未減；這就意味着香港政治情勢更加複雜而尖銳。

一方面，分析和判斷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香港政局不能脫離兩個基本矛盾，換言之，香港何去何從取決於不以任何人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條件。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香港政局變化的具體過程，在頗大程度上

受制於香港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正由於反對派政治力量千方百計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加劇了並且繼續加劇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和香港社會基本矛盾，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香港政治情勢將變得更加複雜而尖銳。

為什麼一本關於中國模式的小冊子成了反對國民教育的導火索？為什麼反對國民教育的風波演變成了繼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以來香港本地的最大政治事件？沒有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拒中抗共」思想和心理固然不行，卻也離不開反對派政治力量的處心積慮。

反對國民教育風波，具有鮮明的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特徵。特區第四屆政府上任僅一個多月，先是發展局長因一件涉及房地產的事件而辭職，緊接着，其繼任者又因為涉及房地產的事情而遭攻擊。為什麼若干媒體以涉及房地產的事情為焦點而香港社會大眾被吸引？不正是折射地產市場已是香港社會基本矛盾的一個縮影？

煽動「拒中抗共」情緒

反對派政治力量竭力煽動社會情緒，既「拒中抗共」又把矛頭對準所謂「地產霸權」即社會基本矛盾的對立面，是為了盡快趕第四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下台，也是為了盡量爭取第五屆立法會更多議席，根本目的則是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

必須指出的是，鑒於新一屆政府已經宣布惠民的五項政策，反對派政治力量眼看在利用社會基本矛盾上無多少空間，就利用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仍然持有的對國家主體政治體制和執政黨的成見和偏見，竭盡全力催發反對國民教育風波。支持還是反對國民教育？支持還是撤回國民教育？已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香港政治的一道分水嶺，形成愛國愛港與「拒中抗共」的鮮明分野。

毋須諱言，眼下，反對國民教育風波是有

一定聲勢的。有些人擔心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遭受打擊，有些人憂慮愛國愛港陣營在第五屆立法會競選中損失選票和議席。於是，希望甚至謀求妥協，同意國民教育科推遲或撤回。這是政治懦夫的見識和行為。「兩軍相爭勇者勝」，軍事如此，政治何嘗不是一樣？

事實上，高舉「拒中抗共」旗幟的政治團體固然是一小撮，但是，主要由於歷史因素，同情、支持反對派政治團體的香港居民為數仍不少。與此同時，在社會基本矛盾中，大多數香港居民站在居財富人塔頂層的少數人的對立面。於是，產生一種幼稚的政治觀點：欲佔據香港的領導地位，必須同時在社會基本矛盾和政治基本矛盾中站在大多數或多數一邊。

經濟一體化不可擋

這樣的觀點之所以幼稚是因為，從簡單統計數據看，大多數香港居民在社會基本矛盾中與少數富人對立。同時，多數香港居民在政治基本矛盾中仍未認同、支持愛國愛港陣營，但是，實際上，頑固支持「拒中抗共」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香港居民的心理和情緒是矛盾的。誰如果相信上述觀點而實踐之，那麼，必將事與願違。

更重要的是，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已是不可逆轉不可阻擋的大勢所趨，任何阻擋這一滾滾歷史洪流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必將落得「螳臂擋車」的下場。香港居民，凡是以香港為終身之家的，則必將順應這一歷史潮流而建立並加深對國家歷史、現況和未來的應有認識。

可以相信，只要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長期，香港的政治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矛盾必將得到妥善解決。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所面對的困難，不過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途程的一個階段。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鏡報》35周年憶徐老

□許智明



我們敬愛的徐老——徐四民先生，他是香港一面愛國愛港的不倒旗幟，他把《鏡報》當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窮畢生的精力經營《鏡報》，把生命獻給了《鏡報》。即使在瀕瀕之際，他仍向前來探病的同仁們詢問《鏡報》的情況，令在場人士均十分感動，終身難忘。

愛國愛港的旗幟

1977年8月創刊至今已35個年頭的《鏡報》，經歷了港英統治下堅持「愛國愛港，仗義執言」的難辛和香港回歸祖國後過渡期間中英角力的風雨，也見證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環境下的繁榮和穩定；作為一本立足香港的民營政論月刊亦在歷練中壯大，行銷亞非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這慶賀創刊三十五周年成果的時刻，本人不禁緬懷《鏡報》的創辦人、愛國愛港代表人士徐四民老先生，內心充滿了感慨。

上世紀90年代，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政治形勢決非如今這樣清晰明朗。儘管中英當時已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已進入回歸祖國的後過渡期，但是有人仍唯恐天下不亂，在為香港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製造種種障礙，港英當局長期的反共宣傳和社會各界當時與內地交往的欠缺，使部分香港人存在着疑慮和誤解，一時風聲鶴唳，萬馬齊喑，山雨欲來風滿樓。

回歸之前香港的政治生態，堅持愛國愛港主張並非像現在這樣輕鬆自然或理所當然，當時香港各界如有親近北京的言論或行為，仍然都會感受到有形和無形的各種壓力與困難，一本政論雜誌能仗義

執言，針砭時弊，揭露港英，歌頌祖國，是需要無所畏懼的膽識和勇氣，徐老就是《鏡報》雜誌的精神力量和中流砥柱，令人產生十分的敬意。

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有幸經國家領導人的推介，我與徐老有了直接的聯繫和交往，使我經常就時事和政治等問題向徐老請教，聆聽徐老精闢的分析。我對徐老的敬重，徐老對我的愛護，使我們成了忘年交。

回想當年我認識徐老之初，由於素仰他的愛國、愛港、愛鄉的高尚情懷，欽佩他對正義事業的不懈追求和堅定信念，信服他對社會和某些政府官員中存在的不良現象與不正之風所作出的大膽批評，因而，對他秉承「誠實敢言，振興中華」宗旨創辦並經營《鏡報》產生敬意。相同的理念，相近的見解，是我遵照徐老的囑託，最後參與《鏡報》事務管理的重要成因。我和徐老對《鏡報》情感與使命，可以說是「心有靈犀」的。所以當徐老同我談起共同為《鏡報》出力時，我是毫不猶豫，我倆可謂一拍即合。2001年，我應徐老邀請正式加盟《鏡報》，並獲推選擔任副董事長。

為鏡報做些事

在參與《鏡報》管理的十多年中，使我有機會不斷加深對徐老的了解，也加深了我與《鏡報》的感情。徐老早年僑居緬甸仰光時，已是知名的愛國僑領。他懷着滿腔熱血，冒着生命危險，投身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偉大運動；抗戰勝利後，他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創辦《新曙光報》，堅持愛國正義的立場，反對內戰，宣傳民主。他移居香港後，和幾位知名愛國人士一起創辦《鏡報》，克服重重困難，使《鏡報》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為了辦好《鏡報》，徐老身體力行，親力親為。他親自聯絡採訪對象，並帶同記者前往採訪；他經常親自打電

話給廣告客戶徵訂廣告，為《鏡報》增加財政收入；《鏡報》每期發表的重要文章，他都要親自審閱；他還親自動筆撰寫社論和文章，針砭時弊，伸張正義，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筆耕不輟，堅持以文章回饋社會，報效祖國。我在《鏡報》同徐老接觸的機會更多了，他的愛國情懷，他的高風亮節，他的堅韌意志，令我深受感動和教育。徐老是我的良師益友，對我言傳身教，影響至深。

發揚優良傳統

2007年3月，這一年，正是《鏡報》創刊三十周年。由徐老推薦、並由董事會一致推選我出任《鏡報》新一屆董事會的董事長。可是，卻在這一年的9月9日，敬愛的徐老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了我們，《鏡報》同仁悲痛莫名。徐老的離世，無疑是《鏡報》的巨大損失。我十分清楚：《鏡報》是經過三十年風風雨雨的考驗，已經成長為在海內外均具影響力的政論刊物，成為一個愛國愛港、報道翔實、言論中肯的政論雜誌品牌。而這一切，是在徐老的親自領導、主理和歷任董事們的卓越貢獻，以及長期以來全體員工的艱苦努力是分不開的。現在，讓我擔負起領導《鏡報》的職務，我深深感受到擔子的沉重。

徐老的後人遵循徐老的遺願，接辦《鏡報》，表示要同心協力、全力以赴繼續把《鏡報》辦好。2009年，《鏡報》新的董事會宣告成立，我再次被推選為這一屆董事會的董事長。我將會竭盡全力去完成這個歷史使命，決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在《鏡報》創刊三十五周年之際，我衷心希望《鏡報》全體同仁團結一心，繼承《鏡報》的優良傳統和徐老的精神，並將之發揚光大；也寄望《鏡報》的新老朋友們繼續關心和支持《鏡報》，而把《鏡報》越辦越好。